

上海书评 第1辑

迟来的封赏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编



迟来的封赏

《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来的封赏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10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

ISBN 978-7-80678-989-6

I. 迟… II. 东…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7142 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技术编辑 吴 放

迟来的封赏

《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989-6 / I · 220

定 价 20.00 元

迟来的封赏

《上海书评》第1辑

CONTENTS

访谈 & 口述

- | | | |
|-----|--------------|-----|
| 003 | 余英时谈钱锺书 | 傅 杰 |
| 007 | 梁文道谈《沉思录》 | 张明扬 |
| 011 | 侯外庐先生印象 | 何兆武 |
| 015 | 陆谷孙谈都德 | 盛 韵 |
| 020 | 许倬云谈古代“三农”问题 | 黄晓峰 |

特稿 & 书评

- | | | |
|-----|----------------|-----|
| 027 | 真的康德 | 张汝伦 |
| 031 | 失落的 0.00159265 | 刘 铮 |
| 034 | 轻浮年代 | 小 宝 |
| 038 | 我看中医养生 | 张荣明 |
| 042 | 谋杀在牛津 | 张 楠 |
| 046 | 漫谈周作人的事 | 黄 裳 |
| 050 | 钢和泰年谱订误 | 高山杉 |
| 053 | 小叙事,大颠覆 | 陆谷孙 |
| | 附录 丘吉尔镇住“屁眼小人” | |
| 058 | 五月风暴:回荡四十年 | 陈 彦 |
| 062 | 李约瑟的中国情缘 | 林行止 |

CONTENTS

068	价格,与收藏无关	万君超
071	对“全球变暖”说的质疑	葛剑雄
075	揭开油价暴涨的“黑幕”	叶 辉
080	覆水年华	叶 扬
085	谭慕愚:顾颉刚的“一生之痛”	赵灿鹏
089	私下的激情阅读	小 白
093	赤壁之战一千八百年	吴金华
097	读懂《黑天鹅》需要了解的……	汪丁丁
102	天气真的改变了历史?	叶 辉
106	日常琐事中发掘经济学道理	王则柯
112	蒋介石研究:从“险学”到“显学”	申正言
116	刘文典的“不狂”	高山杉
120	带 N 本书去巴黎	刘 铮
124	未适的新土	苏友贞
128	首航台湾日记	钱文忠
133	全球化:从时髦词到诅咒	陈冠中
137	“小李飞刀”那样的哲学家	高山杉
141	山冈庄八的“战争与和平”	李长声
145	关于“天下无双”这个字眼	张惠善
149	“我老人家”的杂文	王学泰
153	哲学不能解释的爱	杜小真

CONTENTS

157	媒体的前景和报业的现状	林行止
161	新三国时代的诞生	叶辉
166	世俗时代的死亡问题	刘擎
170	重复,坚持重复	毛尖
174	一个中国通的处女游	虞云国
178	“英国衣”是什么东西	张南菱
182	梅毒·麻风·解剖图	小白
187	故事中套故事	恺蒂

笔记 & 随笔

193	乔志高先生	董桥
195	爱国货就是爱国	梁文道
196	风闻	张大春
199	啊!他来是为了这个	毛尖
200	知道的……“以后会慢慢说”	李公明
202	最辣的思想家	小宝
204	麻雀和我	北岛
205	巴图鲁	张大春
207	你配得上《杨柳风》么?	恺蒂
209	“我没事,我武功很好”	傅月庵

CONTENTS

210	图像与历史	
	——该轮到起诉出版物中的“周老虎”了	李公明
212	迟来的封赏	乔纳森
214	从霞飞路说起	施康强
216	“他们老不把我当老头”——记方成	王学泰
218	浑家·拙荆·夫人	刘绍铭
220	陆小曼为李仙根模马	董 桥
221	马尿、理性与译经——答 B 君	冯 象
225	让我们先来好好地就事论事吧！	李公明
227	光棍缔造文明	小 宝
229	善本	梁文道
231	金陵生小言	蒋 寅
233	购买天价艺术品是为了欣赏？	林行止
235	《围城》中的一个细节	谢 泳
236	被“官火”烧痛的……	李公明
238	一个堕落的公共知识分子？	乔纳森
240	吓人的新知	张大春
243	关于《青鹤》	王稼句
244	不悔少作	黄 裳
246	几本台湾老游记	舒国治
247	牢中作业	刘绍铭

访谈 & 口述

余英时谈钱锺书

傅 杰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

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了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恭绰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是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

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

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 he 把它们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

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有学者批评钱先生缺乏问题意识。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先生,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它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它?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2008年5月25日)

梁文道谈《沉思录》

——张明扬

作为香港的独立书评家、电视读书节目主持人，梁文道熟晓《沉思录》久矣。早在去年这本书被温家宝总理称为“枕边书”而家喻户晓前，梁文道就曾在其《弱水三千·梁文道书话》一书中撰文推介过。

说到《沉思录》，梁文道谈兴颇浓，从“世界主义”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从“哲人王”到儒家的“内圣外王”，一说就是快一小时。在他看来，《沉思录》可以帮助“处理天下忧的同时，保持自己心情的平和”，也可以提示国人“即使没有神的信仰，也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追求”。

罗马的世界主义

《沉思录》在体例上有点像《论语》。

梁：《沉思录》内容比较零碎，其中充满了各种道德启示和关于做人方式的讨论，或许有点像论语。但《沉思录》是否能达到《论语》这样的地位很难讲，在西方历史上，能达到《论语》地位的大约只有《圣经》和其他少数几本经典（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了。

《沉思录》的作者奥勒留皇帝奉行斯多葛派哲学，和中国的诸子百家相比，斯多葛派更倾向于哪一家？

梁：斯多葛派强调清心寡欲，从这个角度上看，或许和墨家学派很接近。斯多葛派的追随者大都有样子可以看得见的，穿着很粗糙的衣服；睡觉不睡高床软枕，睡木板床就好了，各方面对物质要求很低很低。

但在强调与自然和谐这一方面，斯多葛派又很像道家。但斯多葛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思想中有了神的观念，包含了希腊罗马的多神信仰，与自然的和谐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之上的，但同时多神信仰做了哲学化的处理。

斯多葛派又有与儒家相像的一方面，强调与社会秩序和谐，各安其位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斯多葛派超越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一点是,他们强调了世界公民的观念,认为在人类与宇宙和谐这个状态之下,天底下的人都是可以沟通的,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思想在里面。

那就谈谈世界主义吧。那个时代的罗马为什么会产生世界主义?

梁:事实上世界主义在希腊时代便开始出现,但在罗马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强调。

希腊之前并不是一个国家,是由雅典、斯巴达等一个个城邦国家构成的,而一开始世界主义作为哲学上的一种主张,正是建立在由希腊诸多城邦构成的世界观上的,当时的世界公民概念还局限于希腊人所知的地中海世界。希腊人认为,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城邦,但我们供奉共同的神灵,有着一样的民族传统,分享着如奥运会这样的共同的文化活动。

而到了罗马时代,世界主义的内涵则得到了放大。罗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这样的帝国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让那么多持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同生活方式甚至不同宗教的人,都能和平共存于罗马帝国的旗帜之下。因此罗马帝国在很长的一段承平时期中,对异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是很宽容的,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叫作“宽容是一种帝国的美德”,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主义就很符合罗马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有一个很根本的论点就是,把其他不同民族的人看作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要有欲望去了解和与自己不一样的民族,然后同情共感地去知道他们的想法、态度和感情,这或许就是宽容作为一种帝国美德的前提吧。

同时罗马也很强调“蛮族”这样一种概念,英文中“barbarian”一开始的意思就是边缘边境的人,罗马人惯于把国境以外的人当作蛮族。事实上,世界主义尽管为包括奥勒留皇帝这样的少数人所信奉,但很难说是罗马帝国最主流的想法,也未必会为每个人都接受。如果宽容的帝国美德真的一直为罗马帝国上下所一致遵守,也就不会发生后来对基督徒的迫害了。

《沉思录》中谈论的问题很多,您为何如此注重世界主义?

梁:当前的全球化趋势是无法逃避的,世界主义其实是一种伦理学的态度。我们的世界,客观看来是全球化的世界,相应地在价值上和伦理上也应有一套与之对应的行动准备和框架。而世界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很重要的框架。

西方世界很多人说中国应改善人权问题,原因也和世界主义有关,他们未必是要妖魔化中国,反而是替中国老百姓着想。比如说,西方有一些年轻人会反对购买耐克球鞋之类的货品,认为这些大型国际财团和制造商卖的东西很便宜,那是因为在中国制造和采购的,而如此便宜的基础是中国劳工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

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享受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之余,其实背后都有中国劳工的血汗。他们会思考,当他们购买这些商品时,究竟能否改善这些劳工的生存状况,他们觉得自己对中国的劳工负有道德责任。

任何伦理学理论都会认为,我们是不能伤害其他人的,但从传统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伤害的是身边的人或者可见范围内的人。但现在外延却扩大了,凭传统习惯很难想像,我们今天开车制造了很多废气,助长了全球暖化,原来是会影响到世界另一端不同民族的人,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人。

在这一状况下,世界主义就变得很重要,它让我们发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其实是与全世界的很多人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所谓做一件好事或坏事,所牵涉的面可能已远远超过我们日常可见的范围和自己所处的社群之外。

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奥勒留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哲人王”吗?

梁:奥勒留在当皇帝时被人称为“哲学家皇帝”。柏拉图的“哲人王”是构思出来的一种角色,奥勒留并不是他那种理念的实现。反而儒家说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和柏拉图的“哲人王”还可以比较一下。

奥勒留早在当皇帝前就被当作哲学家了,为什么呢?作为奥勒留唯一的重要著作,《沉思录》在他登基时还没写出来,但他还是被当作哲学家。在希腊罗马时代,很多著名的哲学家,一没有著作,二不演讲,三没有学生徒弟,但仍然被当作哲学家。这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哲学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学术工作,一种书面的东西。

不同的哲学流派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作为罗马帝国最显赫的哲学流派,斯多葛派的追随者不仅仅是做学问,更多的是在生活方式上体现出来。奥勒留在当皇帝之前,就穿着一一种很简陋的皮袍,并且是从年头到年尾的,当时被认作是斯多葛派的穿衣服饰。

当时有个小八卦。作为帝国的象征,罗马帝国的皇帝往往穿的是传统的紫红色的长袍,人们认为这样才能显示出帝国的光荣和荣耀。帝国的大臣很担心,皇帝不会在登基之后,还穿得像乞丐一样。

哲学对治国究竟有多少效用,哲学家当皇帝也没治理出一个“理想国”。

梁:对于奥勒留是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现在争论很多。但在西方传统的概念里,奥勒留是被当作一个好皇帝的。《君王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罗马帝国五个好皇帝,按时间排名最后的就是奥勒留。这一说法后来也被很多学者所认同,比如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吉本。

的确,罗马帝国在奥勒留之后就由盛转衰了,但与其说这是奥勒留的问题,还不如说这是外在环境改变的结果。首先,奥勒留在位期间经常御驾亲征,罗马帝国在东方的老对手帕提亚,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安息帝国在挑战罗马,北边在多瑙河边的日耳曼等很多蛮族在骚扰边境;同时,奥勒留也遭遇了罗马帝国罕见的大瘟疫,人口下降的数字很厉害。可以说,他在位期间,天灾人祸是接连不断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可以去分析哲学对奥勒留统治的影响。奥勒留的

《沉思录》实际是他的日记,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灵修,在整理思绪与笔记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自己做人的方式。在这本书中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并没有非常严密的体例。好比他反复谈到不能太注重俗世的名声,那是因为很多时候他都会遇到被人歌功颂德的情况,这时他都会提醒自己要小心。

在这样的乱世中,哲学实际上是给了奥勒留心灵的安慰,提醒他不要单从皇帝的角度,而要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哲学保证了他不至于迷失在皇位的虚荣当中,在遇见种种繁杂的政事之时,起到令他保持平静、不忘人格完善这样一种作用。

基本可以这样说,哲学对于奥勒留的治国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学院化哲学来自西方,而且出现得比较晚。而早期的哲学是强调修行的,中国也一样,儒家是强调修身的。我这里不是想批评现代的学院化哲学,而是觉得我们也不应当放弃以往古典哲学的理念。除了温家宝总理之外,很多国家首脑包括丘吉尔和克林顿在内都将《沉思录》作为床头书,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处理天下忧的同时,保持自己心情的平和;在面对繁华的尘世时,不忘记对自身的把持。特别能让他们感同身受的是,《沉思录》是古罗马皇帝写的。打个比方,总理每天都会听到类似“人民的好总理”这样的称赞,他当时或许很高兴,但当他回家翻开《沉思录》之时,可能就要提醒自己不要为这样的称赞所迷惑。

《沉思录》应该说是超越了斯多葛派了。

梁:虽然斯多葛派背后是有神的预设的,但《沉思录》应该说是已经超越了对神的信仰,即使你不认识奥林匹克山上的诸神,这本书也可以去读。温家宝总理是无神论者,一样可以从中获益。斯多葛派背后的神是多神信仰,但基督教徒也看这本书。《沉思录》不是属于某个宗教的,而是所有宗教的人都可以领略到这本书背后的灵性的层面。当我们有追求心灵的平静这样的态度时,我们实际上已触碰了灵性的东西,我可以不相信某个神,但灵性的层面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说很有意思。在“9.11”之后,大家开始检讨宗教之间的冲突,西方一些基督教徒也变得很极端,要求学校里不能只教进化论,还要教创造论。因此又有一种反击的力量,认为现在应该提倡“新无神论”,很多知名的大学者还联合起来推动这个主张。但这两年有了新的变化,有些学者提出你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却可以保留灵性的东西,一个无神论者也可以进行精神的修炼。

对于现在的中国,很多人说道德败坏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回过头来看,以前的儒家也没有明确的神的信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假设神灵存在的灵性传统和精神传统。这在现代中国是很有需要的。我们可以没有神的信仰,但我们不能没有一种对于精神上的追求。奥勒留这本书在这方面就特别有意义,《沉思录》虽然有神学的背景在,但神学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抽离出来的。

(2008年7月6日)